

李道英 著

八大家古文选注集评

国·学·丛·书·国·学·丛·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学丛书·

八大家古文选注集评

李道英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新登字04号

· 国 学 丛 书 ·

八大家古文选注集评

李道英 著

特约编辑：韦向学 责任编辑：桑林佳 周季平 封面设计：王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5 字数：550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7—5633—2110—1/I·142

定价：27.00元

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执行主编：王 洪

委 员（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

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

叶嘉莹（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授）

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

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党玉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

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笃文（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王 洪（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

李殿魁（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王保珍（台湾大学教授）

陈耀南（香港大学教授）

黄兆汉（香港大学教授）

冯瑞龙（香港浸会学院副教授）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李炳汉（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

成元庆（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

柳晟俊（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斯蒂芬·欧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萨进德（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唐凯琳（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

前 言

在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唐宋古文占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散文，从《尚书》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两个散文传统：一是先秦两汉时期自然质朴、散句单行的散文传统，二是六朝时期辞采华艳的骈文传统。自齐梁骈文达于鼎盛开始至中唐前期，虽然骈文始终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但古今文体之争一直在激烈进行。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早就提出了文体复古的任务，提出过一些理论主张，也有不少人进行过古文创作的尝试，但在韩、柳之前，一直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其根本原因，不但在于他们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指导，而且在于他们在文体演进的问题上陷入了形而上学。他们中的不少人盲目崇拜古代的东西，把古代的一些典籍视为千古不变的楷模，刻意摹仿，而对骈体文则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表现出一种真正复古以至食古不化的倾向；另一些人则一边批评骈体文的弊端，一边又用骈体文进行写作，和骈体文划不清界限，表现出一种“容骈”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阻碍着作家们全面、正确地继承前代优秀的文学传统，因而大大影响了散文的健康发展。

中唐韩愈、柳宗元登上文坛，大力倡导古文。所谓古文，亦即古典散文，它是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当时骈文被称为时文、今体，而韩柳意在反对骈体，恢复先秦盛汉时的散文体制，故称古

文。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始于韩愈，后人因之。韩愈和柳宗元，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都没有给“古文”下过定义，倒是北宋的柳开对古文有个说法：“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这个说法，大体上阐明了古文一词的基本含意。韩柳不仅大力倡导古文，而且认真总结了前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高屋建瓴，提出了一整套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他们提出了“文以明道”、文道结合，重道而不轻文的观点，解决了文坛长期以来未能解决好的文道关系问题。他们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文学命题，并特别强调作家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实际上是较好地解决了作家与现实、作家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他们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主张，如反对骈体。提倡散体；反对浮艳轻靡，提倡自然质朴；反对因袭、剽窃，提倡词必己出、文从字顺等，把文体改革引向深入化、具体化。这样，他们从原则上解决了他们的前辈们所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矫正了前辈们的失误和偏颇，把古文运动置于明确的理论指导之下，使中唐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第一次自觉的文学运动，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韩柳不仅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基于他们对文学作品价值的正确认识和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他们对古文运动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在积极从政的同时，毕生都自觉地献身于文学事业。他们把文章与事业、道德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作文传世之功不在从政为官之下，充分体现了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高度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通过朋友关系、师弟子关系，大力宣传和弘扬古文，组织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古文家，对中唐古文的繁荣和古文运动的深入

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他们自己，不仅成了弟子满门的师座，而且成为古文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

由于韩柳和中唐众多古文家的共同努力，使中唐古文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他们理论上的明确，行动上的坚决，态度的端正，方法的对头，所以他们不仅成功地继承了秦汉式散文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吸收了六朝骈体文中合理的因素。他们不仅继承了两份文学遗产中的精华，而且又大胆创新，把中国的古典散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开出了一代文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韩愈、柳宗元领导中唐古文运动的实践证明：古文运动不是一次文学复古运动，而是在复古旗帜下的一次深刻的散文革新运动，蔡元培先生称之为“文学上一次革命”，实为中肯之论。

然而，中唐的古文运动并未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在韩、柳诸公相继谢世之后，古文运动每况愈下。这除了晚唐社会江河日下的客观条件外，在古文运动内部，由于其理论上的某些不完善以及在古文运动过程中未能及时得以矫正而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弊端。如李翱的过分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而使文章的说教味和道学气都比较浓重，皇甫湜的某种片面追求新奇而使文章流于艰涩怪僻。再加上晚唐大多数作家的“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素质远不能与韩柳并论，这无疑都大大降低了古文的总体水平。而同时，中唐古文运动只是古文与骈文的一次大较量，骈文虽一度处于低谷，但其并未销声匿迹，更未绝种，它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实力，一旦气候适宜，它们便会卷土重来。因此，在古文相对衰落的晚唐，骈文又乘虚而起，历晚唐、五代而至于宋初，骈文又取代古文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

宋代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北宋初年，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上很

快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社会生活的表面繁荣，使得一部分统治者和文人忘乎所以，大肆歌颂升平，鼓吹享乐。最高统治者风起于上，帮闲文人云从于下。一时间，君臣上下，竞为奢靡，文恬武嬉，风流放浪。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愈加明显：文用骈俪，词袭花间，诗为西昆。但是北宋统治者靠对外投降、对内高压的“安内以养外”政策所换来的苟安是不可能长久的。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社会的积贫积弱，与文学的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产生了严重的失调。

面对着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大官僚沉湎于享乐，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是现状的维持派；而一部分出身于中小地主的有识之士则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的矛盾和国家的危机，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他们是现状的变革派。这些人在要求和实施社会变革的同时，强烈要求文学为社会改革服务，要求改变文风。这样，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就伴随着北宋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而兴起和发展。

宋代的古文运动，从根本上讲，是中唐古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从宋初形式主义文风大盛之时起，就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尹洙等人倡导韩柳古文，反对形式主义文风。但除王禹偁等少数人外，多数人并未能学得韩柳的精髓。他们都强调“明道”、“致用”，把文章作为传播儒道、实施教化的工具，都猛烈抨击浮艳颓靡的文风，都崇散斥骈，推尊韩柳，高举韩柳的旗帜，坚持唐代古文运动的大方向，为北宋的古文运动举起了旗帜，制造了舆论，扫清了道路，无愧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一批先驱人物。他们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但也勿庸讳言，他们并未能全面继承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远未达到韩柳的高度。由于他们过分重道和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所以更多地学习了李翱文章的道学气；他们又片面强调“求

深”、“务奇”，其结果是重蹈了皇甫湜等人某些文章拙涩怪僻的覆辙。这就决定了他们古文创作的总体水平不高。他们可以给形式主义文风以打击，但还不足以战而胜之、取而代之。真正战胜形式主义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最后胜利的任务，又历史地落在了以欧阳修为首的一大批古文家的肩头。

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欧阳修。当他跨人文坛之时，形势更加不令人乐观。一方面，西昆余风犹劲，形式主义文风仍在发展；另一方面，古文运动先驱者们拙涩险怪的风气也成为文坛一大弊端。欧阳修在政治上大力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在文学上则积极主张诗文革新。他顺应时代的要求，继承前人的成果，倡导古文运动，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推尊韩愈，确立了以韩文为楷模的奋斗目标，同时又从当时的文坛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古文运动的主张，力主平易自然，对宋朝一代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充分利用自己在政治上、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声望，改革应试文章文风，贬抑浮华无实之文和险怪拙涩之文，提倡质朴平易的古文，不但使“场屋之习”一改，而且选拨和推荐了一批杰出人才，形成了以王安石、曾巩和三苏为中坚的古文运动队伍，为北宋古文运动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是苏轼。他高举韩、欧这两面大旗，从理论和创作实际两个方面大大深化了古文运动。在处理文道关系问题上，他明确提出了“技道两进”的要求，并对“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主张，指明了作家在重道的同时必须自觉地重文，这就把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理论推向了更加自觉的、完全成熟的高度，而他的古文创作也兼容各家之长、出于各家之上。苏轼不愧为唐宋两代古文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古代散文新体制的最后确立、为古文最终战胜骈体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完成者，同时也标志着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结束。

历史赋予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以艰巨的任务，也给予了它们千载难逢的机遇。唐宋两代的古文家们抓住了这个机遇，不负众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创作出了第一流的散文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为丰富我国古代散文艺术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参加者为数众多，但作为唐宋古文最高成就的代表，历代人们公认应属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即所谓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始于明代。明初朱右曾选编了《八先生文集》，第一次将这八个人的作品选编在一起，所以《四库简明目录》说：“‘唐宋八家’之目，实始于此。”然此书影响有限。至明中叶，茅坤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才正式提出了“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并随着这本总集的广为流传，“唐宋八大家”的称号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当然，后人对这种称号也不是没有异意的。如清代的袁枚，对此就颇愤愤然，他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如大轩骀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小仓山房文集·书茅氏八家文选》）清代的储欣也对八家文成就的悬殊发表了颇为激烈的意见，并为了在唐宋两代间搞平衡，编纂了《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把唐代的李翱和孙樵增补入列。这些不同意见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意见归意见，道理归道理，人们在全面、客观地审视了唐宋两代古文家之后，仍然认为茅氏之说较为公允，如果仍然只给八把交椅的话，依然不该有李翱和孙樵的坐席。

自明代以来，唐宋八大家作为一个固定的作家群体和唐宋古文最高成就的代表，已成定论。苏轼曾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这无疑是要充分肯定韩愈在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中的开创性作用和巨大贡献。但如果认为此说有夸大个人作用之嫌的话，那么 we 说，唐宋八大家“文起八代之衰”，则应视为公允之论。唐宋八大家既集以往之大成，又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发挥自己的独创精神，使古文创作的实用性、普及性和艺术性都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理论、新经验，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由他们开创并臻于完全成熟的新体古文，一直是此后近千年文坛的主流派文体，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桐城派古文大家刘大櫆曾说：唐宋两代，“八家之外无文”。单就此论而言，无疑是偏颇的、片面的。然究其初衷，无非是极力称颂八大家文的成就和地位，并非有意对唐宋两代其他作家视而不见。韩愈在《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一文中有句名言：“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这当然也是极而言之夸大之词，故此老紧接着作了解释：“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无良马即可谓无马，以此推之，刘氏之说亦自有其合理之处。

唐宋八大家作为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其创作虽有不少相同点，但风格却各具特色。就唐宋两代而言：“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袁枚《与孙傭之秀才书》），两代有别。就八家而论：韩愈之雄奇奔放，柳宗元之简洁清峻，欧阳修之平易婉曲，王安石之雄健峭拔，曾巩之醇真浑厚，苏洵之纵横恣肆，苏轼之行云流水，苏辙之汪洋淡泊，风神自具。而这些特点，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因此，要了解八大家，要学习和研究他们的创作经验，欣赏他们的艺术杰作，最可靠、最基本的途径是阅读他们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作品。自明中叶茅坤氏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

面世之后，历代编选、评注八家文的本子可谓多矣，近几年来各种选注本也属多见，然稍感缺憾的是尚无一个精选的详注集评本。为弥补缺憾，编者尝试搞了这本《八大家古文选注集评》。

本书精选八大家各方面的代表作品一百篇，其中既有历来家传户诵的脍炙人口之作，也有历来公认是名作而一般选本鲜有选入者，还有少数是笔者认为在某方面具有特色的。每位作家均有简介一篇；每篇作品的第一个注多为题解性质，但均对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特点有简要的说明和提示，同时兼及作品的历史地位。每篇作品在详注之后均有集评，汇集历代人们对本篇作品的重要评论。集评以古、近代为主，也酌选少量现当代名家之说。评论兼容正反不同方面的意见，以供读者参阅。本书力求兼顾普及性与专业性，使之既适合各类高校中文系学生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及专业工作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由于八大家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有别，故选篇之多寡亦颇为悬殊。就选篇多少而言，重点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王安石、曾巩次之，苏洵、苏辙又次之。在韩、柳、欧、苏四家中，因韩愈为八大家之首，其文章于后世影响亦最大，历来的重要选本也都选篇最多，故本书亦援惯例多选，篇目远出于三家之上。

鉴于八大家名作太多，不能尽选；历来评论太多，无法尽收，故只好不得已而有所割舍。鉴于本人水平有限，故选篇未必尽当，难免遗珠之恨；集评选择未必完备，难免挂一漏万。疏陋舛讹、偏颇失误之处，敬请方家及读者赐教。

本书的“集评”部分选录或参考了有关的专著及资料汇编，在此一并致谢。

李道英

1995.7.

目 录

韩 愈

原道	(3)
原毁	(16)
杂说 (四首选一)	(20)
师说	(24)
进学解	(30)
圯者王承福传	(43)
讳辩	(50)
伯夷颂	(57)
张中丞传后叙	(63)
燕喜亭记	(73)
画记	(79)
蓝田县丞厅壁记	(88)
争臣论	(94)
上宰相书	(107)
答李翱书	(120)
与李翱书	(129)
与崔群书	(134)
送孟东野序	(142)
送李愿归盘谷序	(150)
送董邵南序	(158)
送浮屠文畅师序	(164)
送高闲上人序	(171)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178)
祭十二郎文	(185)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195)
贞曜先生墓志铭	(204)
平淮西碑并序	(212)
柳子厚墓志铭	(232)
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242)
毛颖传	(248)
送穷文	(257)
论佛骨表	(264)

柳宗元

封建论	(273)
桐叶封弟辨	(293)
段太尉逸事状	(299)
捕蛇者说	(308)
罟说	(313)
蝥贼传	(315)
三戒	(318)
种树郭橐驼传	(324)
杨评事文集后序	(329)
送薛存义序	(336)
愚溪诗序	(341)
游黄溪记	(348)
始得西山宴游记	(354)
钴姆潭西小丘记	(358)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364)
袁家渴记	(368)
小石城山记	(373)
与李翰林建书	(378)
与韩愈论史官书	(385)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395)

欧阳修

秋声赋.....(408)

朋党论.....(414)

泂冈阡表.....(421)

黄梦升墓志铭.....(432)

尹师鲁墓志铭.....(437)

丰乐亭记.....(446)

醉翁亭记.....(451)

真州东园记.....(457)

苏氏文集序.....(462)

送杨置序.....(467)

梅圣俞诗集序.....(471)

送徐无党南归序.....(476)

答吴充秀才书.....(480)

祭石曼卿文.....(485)

与高司谏书.....(490)

读李翱文.....(499)

记旧本韩文后.....(504)

五代史伶官传序.....(509)

苏洵

六国.....(516)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522)

送石昌言使北引.....(539)

曾巩

战国策目录序.....(535)

宜黄县县学记.....(540)

寄欧阳舍人书.....(548)

墨池记.....(554)

越州赵公救灾记.....(558)

王安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566)

读孟尝君传.....(575)

答司马谏议书.....(579)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583)

游褒禅山记.....(587)

祭欧阳文忠公文.....(591)

苏 轼

赤壁赋.....(597)

教战守策.....(605)

方山子传.....(612)

上梅直讲书.....(617)

答谢民师书.....(622)

喜雨亭记.....(628)

文与可画篋筍谷偃竹记.....(633)

石钟山记.....(640)

超然台记.....(647)

潮州韩文公庙碑.....(655)

文说.....(670)

日喻.....(672)

记承天寺夜游.....(677)

留侯论.....(679)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688)

武昌九曲亭记.....(693)

黄州快哉亭记.....(697)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尝自称“昌黎韩愈”，世人遂称“韩昌黎”。三岁而孤，由大哥韩会及嫂郑氏抚养成人。自幼备受艰辛，然苦读书，通六经、百家学。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又三试博学鸿词不第。后辗转于汴州、徐州做幕僚。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时，因上疏要求减免百姓租赋而触怒权贵，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初年召为国子博士，转都官员外郎、职方员外郎、史馆修撰等。元和十二年（817）以行军司马之职佐裴度平淮西，因战功升刑部侍郎。后因谏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召为国子祭酒，又任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世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一生积极关注时政。早年即立下“志欲干霸王”的志向，热心从政。其思想极为复杂矛盾。他一生以儒者自命，但又多离经叛道言论，实则是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诸子思想。他一生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宦官干政，排斥佛老，任人唯贤，力争改变社会现状。他直言极谏，敢于抗争，表现了其政治勇气和卓见。

韩愈是杰出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活动家。他对中国文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倡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提出了明确的文学主张，诸如“文以明道”，气盛言宜，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词必己出，文从字顺等等，指导古文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他为